

「三反」運動中幹部隊伍的清理

• 劉德軍

目前學界對「三反」運動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視角，第一種是以反腐敗為立論的視角，認為「歷時半年多的『三反』鬥爭的實質，是在執政情況下保持共產黨人和國家幹部的廉潔，是反腐敗這一長期鬥爭的勝利的初戰」^①。另一種是以黨、工人和資產階級的關係為視角，認為通過「三反」、「五反」運動，改變了中共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認識，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開始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②。這兩種觀點無疑都有其合理性，有利於深化對「三反」運動的研究。而本研究以江蘇地區為中心，以中共對幹部隊伍的不斷清理為切入點，釐清在「三反」運動中中共關於通過這一運動純化幹部的種種指示，認為「三反」運動的實質也是一場中共清理幹部隊伍的政治運動，以為「三反」運動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本研究以中共對幹部隊伍的不斷清理為切入點，釐清在「三反」運動中中共關於通過這一運動純化幹部的種種指示，認為「三反」運動的實質也是一場中共清理幹部隊伍的政治運動。

一 建國初期幹部隊伍的構成

建國之初的中共幹部隊伍主要由三種人組成：一是老幹部，一般是1949年之前就已經參加工作，除了一部分地下黨員之外，他們中的多數人已經受到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審查和考驗，也得到中共的信任，是各級政府的主要領導幹部；二是新幹部，一般是在1949年之後參加工作的，隨着全國革命的迅速勝利，需要大量的幹部來承擔各種工作，於是中共就大量地吸收了新幹部，他們基本上具有一定的知識水平，中共在吸收他們時也進行了審查，但由於時間緊迫和工作需要，對他們的審查還是不全面的，還沒有達到徹底了解的程度；三是留用幹部，根據中央「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着吃」的政策，在建國之初，對國民黨政府的工作人員採取了留用的政策，這些人員一般被稱為「留用人員」。但是，中共在留用這些人時也是進行了初步的清理，並非全部留用。

1951年3月28日，劉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現在全國有我黨與非黨幹部共約175萬人左右。其中在1949年以前參加革命工作

* 本文得到安徽工程科技學院引進人才科研啟動基金(項目編號：2008YQQ012)的資助，謹致謝忱！

的幹部約60多萬人，他們大都是經過了審查和考驗的，其中問題較少。1949年以後參加工作的幹部約70萬人左右，從國民黨政府機關留下來的人員約40萬人左右，在他們中間還存在着很多很複雜的問題^③。

以蘇南級直屬機關為例，共有幹部8,913名，其中老幹部2,348名，佔幹部總數26.3%；留用人員1,271名，佔幹部總數14.3%；新吸收幹部由兩部分構成，一是組織吸收，有4,662名，佔幹部總數52.3%，一是私人介紹，有632名，佔幹部總數7.1%，如果把這兩者相加，則有5,294名，佔幹部總數達到59.4%^④。這樣的一種幹部構成狀態不僅僅存在於蘇南，也基本是全國幹部構成的反映。

二 幹部清理持續不斷

中共對幹部隊伍的這種構成狀態相當清楚和了解，所以建國後中共對幹部隊伍的清理基本就沒有停止。只是由於現實的需要，一時還不能造就大批為中共所了解和信任的幹部，所以這種清理的規模還處於一種相對較小和隱秘的狀態。我們從下面的這些批示和文件中也可以感受到這一點。

1951年3月18日，毛澤東在〈中央關於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黃祖炎被刺殺事件的通報〉中指出，「必須認識黨內政府內和軍隊內已有少數反革命份子混進來，決不可認為太平無事。現在就應開始注意這個問題，考察可疑的份子，聚集材料。……一有材料，就應做適宜的處置，保障黨、政、軍各級領導機關的純潔和安全，決不可優柔寡斷，姑息養奸，是為至要。」^⑤

3月24日，毛澤東在〈關於同意上海市委鎮反計劃給饒漱石的電報〉中指出，鎮反包括：「(一)社會上的反革命；(二)隱藏在軍政系統舊人員和新知識份子中的反革命；(三)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鎮壓這三方面的反革命，當然要有步驟，不能同時並舉，但是對於黨政軍的某些重要部門特別是公安部門則須及時清理，將可疑份子預作處置，使這些機關掌握在可靠人員手裏，則是完全必要的。」^⑥

3月29日，饒漱石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對一切家屬被鬥被殺之黨員幹部及政府工作人員，如其本人在政治上未經過考驗及仍與惡霸家庭繼續保持聯繫，則應一律調離首腦機關及要害部門，並須進行審查。對政權機關中現已自動坦白登記的反動黨團特務普通份子，可暫留職考查以便收集更多材料，為進行全面整風審幹作準備，但必須立即調離首腦機關及要害部門。對區分部以上的反動黨團特務骨幹份子，雖屬自動坦白、登記，亦應有計劃地採取留職調訓的辦法，進行一面學習一面審查。對一切隱藏在我黨政軍內部，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反動黨團特務份子(不管其為主要或脅從份子)，一經發現並獲有確實證據，即應一律堅決鎮壓。」毛澤東的批示是，「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的。」^⑦

5月21日，中央發出〈關於清理「中層」「內層」問題的指示〉，要求「從現在開始，在今年夏秋兩季，採用整風方式，有計劃、有步驟地對機關工作人員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以便弄清情況，處理一些最突出的問題，提高我們組織的純潔性」。至於清理的範圍，「應包括各民主黨派和政府、軍隊、民眾團體及財經文教等機關的一切工作人員和幹部學校的學生。主要是其中的留用人員和新吸收的知識份子」^⑧。

建國後中共對幹部隊伍的清理基本就沒有停止。只是由於現實的需要，一時還不能造就大批為中共所了解和信任的幹部，所以這種清理的規模還處於一種相對較小和隱秘的狀態。

由此看來，在全國範圍內，建國以後中共對幹部的清理工作始終沒有停止，清理的重點主要集中在留用人員和新吸收人員中，並且也通過整風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和整黨運動等形式，初步對幹部進行了清理和考察。

同樣，江蘇地區對幹部的清理工作也始終沒有停止，這種清理主要是集中在留用人員、新吸收人員和地下黨中。到1951年9月止，蘇南松江地專機關通過採取送蘇南繼續學習、精簡回家、調離重要崗位、就地撤職等辦法，一共清理被認為有問題人員356名^⑨。

如前所述，中共也通過鎮壓反革命運動來對幹部進行清理，如中共常州地委在〈本區關於整理中層的進行情況報告〉中指出^⑩：

地委、專署直屬機關以及所有在常州市的公營企業，參加鎮反學習的有2,382人，在鎮反學習前的初步整理材料：國民黨員111人，內有區分部以上7人；三青團員69人，內有分隊長以上的13人；其他反動黨團4人；偽軍72人，內有少校1人，連長以上27人；偽政府人員49人；偽憲警18人；地主惡霸6人；反動會道門20人；叛徒7人；特務23人，內有小組長以上10人；嫌疑22人；可疑的61人。經學習後，各種數字除原有的數字又增加：國民黨員60人，三青團員40人，特務10人，反動會道門49人，防諜組2人，復興社1人，共和黨1人，偽軍6人，偽政府人員3人，嫌疑份子3人，可疑份子67人，共產黨員自首份子2人。

通過這種清理，中共逐漸地加深了對幹部隊伍的認識和了解，同時也清理出一部分被中共認為是有政治問題或歷史不清的人員。但是，由於這種清理是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同時進行的，所以還未能成為工作之中心。並且，這種清理也是在缺乏大量幹部的情形下進行的，因此，中共對被認為有問題人員的清理還是較為謹慎的。如果將他們全部清理出去，就需要大量的新幹部進行補充，但當時沒有這麼多新幹部。所以在「三反」運動之前，中共還沒有對幹部隊伍達到徹底的認識和了解的程度，各個機關和單位都還存在着較多被中共認為有政治問題和歷史問題的人員。如在蘇南區常熟市各級機關中就有被認為是不純的幹部233人，其中外來幹部2人，新吸收幹部95人，留用幹部136人^⑪。

這種情況對中共來說，是難以滿意的，因為「中共一直把清理內部、純潔組織看成是一項事關革命成敗、勝利果實能否保持的極為重要的問題；建國後，又視之為一項成功的經驗加以繼承與發展。事實上，建國後，在黨、軍隊和國家機關進行清理本身，都是歷次政治運動的重要內容」^⑫。而隨後進行的「三反」運動，則基本上達到了中共徹底了解幹部、清理組織的要求。

建國後中共對幹部隊伍的清理是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同時進行的，所以還未能成為工作之中心。這種清理也是在缺乏大量幹部的情形下進行的，因此，中共對被認為有問題人員的清理還是較為謹慎的。

三 「三反」運動的目的是徹底清理幹部

1951年12月1日，中共正式發動「三反」運動，在某種意義上，這一運動的實質也是一場徹底清理幹部的運動。通過對資料的仔細梳理，我們可以發現中共中央對「三反」運動的這一目的有着清晰的認識和明確的指示。12月1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在給毛澤東並中央的報告的批語〉中明確指出，「這場運動〔「三反」運動〕實際上就是審幹、整黨運動的開始和過去清理『中層』的繼續深入」^⑬。

1952年2月3日，中央在〈關於「三反」運動和整黨運動結合進行的指示〉中指出，「『三反』運動又是了解幹部，教育幹部的一種最好的辦法。各級黨委、政府、群眾團體和部隊的領導機關，在『三反』鬥爭中，應該對所屬幹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須毫不遲疑地開除一批喪失無產階級立場的貪污蜕化份子出黨，撤銷一批嚴重的官僚主義份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進、消極疲沓、毫不稱職的份子的領導職務」^⑭。

3月，劉少奇在向蘇聯大使通報情況時說的一段話，言簡意賅地指出了「三反」運動的目的就是清理幹部隊伍，他說^⑮：

審視出現的形勢，黨中央採取了清理黨的隊伍的堅決措施。所有犯有貪污、腐化、官僚主義罪行的人，都被我們清除出黨。如果必要，我們還不就此罷休。我們把所有這些人清除出黨，用忠誠可靠的人加強黨的隊伍，用來自工人階級、貧苦農民一方的積極份子和生產突擊手補充黨的隊伍。我們把嚴重腐敗份子、貪污盜竊份子送上法庭，關入勞改營，投入監獄，而查明的罪大惡極份子則被槍斃。隨着這一運動同時還查明，解放戰爭時期投靠我們而很少經過考驗的那部分黨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們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們當中，有的是地主、富農、商人、國民黨份子等人的子弟。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資產階級接近，所以他們一同民族資產階級接觸便產生了共同語言，走上了同民族資產階級完全合作的道路。

而地方黨組織和政府的指示也印證了「三反」運動的這一目的。1952年1月26日，蘇南區黨委組織部在通知中指出，「通過『三反』運動來了解黨員、幹部情況，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和良好的方法，各級黨的組織，必須抓緊進行這項工作，為此，特做如下規定，第一，每一個參加『三反』運動的黨員和幹部，均須在運動結束前，根據這次檢查的內容，寫成『三反』自我檢查，由組織考察了解；第二，各級黨委組織部門與政府人事部門，應有計劃地將幹部在『三反』運動中所作的自我檢查報告、大會或小組意見的記錄、支部及小組意見以及其他有關『三反』的材料，進行收集研究，可作為了解幹部的重要參考材料」^⑯。

此外，蘇南人民行政公署也要求，「結合『三反』『五反』運動，進一步審查機要人員」。經驗證明，「由於部分機關，尤其財經部門部分工作人員不純，使資產階級有空可鑽，大膽竊取國家機密，使國家遭受了損失。因此，各機關應結合『三反』『五反』運動，對接觸機密的幹部進行一次徹底查清，作出結論，凡歷史複雜、『三反』中有嚴重問題者，均應堅決調換。對問題未搞清者，均應迅速徹底查清，作出結論，適當處理。」^⑰

蘇南區委書記陳丕顯認為，在「三反」思想建設階段，主要清理壞份子，搞清幾種人：第一種人，「包括(1)資產階級出身、地主出身，仍保持原思想作風或有發展的，也包括過去歷史關節未交代或不徹底而行動表現很壞的。(2)弄清屬於思想意識的毛病，權位、興趣、不團結，有的是水平低，有的不是水平低即一貫如此的，應有區別。並將其中典型，作為大會上思想鬥爭的對象，對壞的，應作適當處分。(3)教育工作消極，地位也高，不負責任，應在批判後，撤下來。」第二種人，「行政部門較多留用的、新吸收的、派進來的，品質惡劣的，沒能力的應整掉，提出名單，且要發動群眾把他整掉。」第三種人，「資產

南京市稅務局共有779名幹部參加了「三反」運動，暴露問題總人數為92人。暴露問題的性質有資產階級份子、反動黨團骨幹、反動會道門、地主、特務和隱瞞歷史等多種情況。

階級的女兒，一種改了的，一種規矩的，一種腐化了我們幹部的，後者要狠狠的整，務必要整掉，名單應心中有數，拿出預算。」^⑩

3月12日，蘇北區委發出〈關於三反與整黨相結合的通知〉，要求「在三反運動中必須將幹部所有坦白材料、檢舉材料以及商人坦白有關幹部的材料，有計劃的加以搜集和保存，在這一運動告一段落時，應組織一些力量分別加以整理，存檔備查。這是整黨和了解幹部最好的材料」^⑪。

在「三反」運動過程中，中共對幹部的政治面目和歷史情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如南京市稅務局幹部就在「三反」運動中暴露了許多問題。在「三反」運動中，南京市稅務局共有779名幹部參加了「三反」運動，暴露問題總人數為92人。暴露問題的性質有資產階級份子、反動黨團骨幹、反動會道門、地主、特務和隱瞞歷史等多種情況。這種情況說明了通過「三反」運動，中共加深了對南京市稅務局幹部的了解^⑫。

既然在「三反」運動中發現這麼多有問題的幹部，那麼下一步就是要進行清理和處分。下面以蘇南區級機關幹部的處分情況為例，詳見表1。

對於中共而言，在「三反」運動後期，隨着如此多的幹部被清理，迫在眉睫的任務是要大量提拔吸收新幹部來彌補幹部數量的不足，以免對正常工作產生較大的影響。為此，中共蘇南區黨委就幾次發出指示，要求「必須有革命的精神，大膽地大量地提拔幹部，要在現有『三反』基礎上提拔一些『三反』中湧現出來的優秀的積極份子。這是解決幹部缺乏問題的基本辦法」^⑬。

在「三反」運動中，蘇南區級機關提拔吸收新幹部情況如下：第一，蘇南區級機關原有幹部8,913名，新提拔吸收幹部429名，其中主要集中在財經和企業系統，兩者之和為341名，佔提拔吸收幹部總數的79.49%，主要原因是由於在「三反」運動中，貪污份子和被撤職法辦份子主要集中在這兩個系統之中，所以

對中共而言，在「三反」運動後期，隨着如此多的幹部被清理，迫在眉睫的任務是要大量提拔吸收新幹部來彌補幹部數量的不足，以免對正常工作產生較大的影響。

表1 蘇南區級機關幹部撤職降職及清洗法辦統計表

單位：人

| 項目 | 部門 數字 | 黨務 | 群工 | 政法 | 財經 | 文教 | 企業 | 總計 | 百分比 (%) |
|---------------|----------|------|------|-------|-------|------|-------|-------|------------|
| | | 系統 | 系統 | 系統 | 系統 | 系統 | 系統 | | |
| 「三反」前幹部總數 | | 668 | 446 | 1,000 | 2,714 | 579 | 3,506 | 8,913 | — |
| 逮捕法辦及撤職降職數 | | 26 | 24 | 61 | 126 | 18 | 172 | 427 | — |
| 佔各系統幹部數百分比(%) | | 3.89 | 5.38 | 6.1 | 4.64 | 3.11 | 4.91 | 4.79 | — |
| 政治 情況 | 共產黨員 | 17 | 6 | 39 | 23 | 8 | 36 | 129 | 30.21 |
| | 青年團員 | 0 | 5 | 0 | 3 | 5 | 11 | 24 | 5.62 |
| | 群眾 | 9 | 13 | 22 | 100 | 5 | 125 | 274 | 64.17 |
| 來源 | 老幹部 | 20 | 6 | 46 | 29 | 9 | 45 | 155 | 36.3 |
| | 新吸收 | 3 | 18 | 12 | 31 | 8 | 84 | 156 | 36.53 |
| | 留用 | 3 | 0 | 3 | 66 | 1 | 43 | 116 | 27.17 |
| 原因 | 貪污 | 23 | 23 | 51 | 91 | 17 | 145 | 350 | 81.97 |
| | 政治、歷史問題 | 2 | 0 | 6 | 16 | 0 | 4 | 28 | 6.56 |
| | 品質惡劣、右傾 | 1 | 1 | 4 | 19 | 1 | 23 | 49 | 11.48 |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蘇南分行三反前後人事工作情況匯報〉，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70，長期，案卷號1823。

其所需要補充的幹部數量也就較多。第二，從提拔吸收新幹部的政治情況看，計有黨員173名、青年團員113名和青年143名，分別佔到提拔吸收幹部總數的40.33%、26.34%和33.33%。第三，從提拔吸收新幹部的來源看，老幹部176名、新吸收幹部202名和留用人員51名，分別佔到提拔幹部總數的41.03%、47.09%和11.89%²²。

雖然，我們無法對這些新提拔幹部進行更細緻的分析，但由於在提拔時秉承的是「大量提拔在『三反』運動中的積極份子」的原則，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些被提拔的幹部基本上是對新政權和中共持有認同感、能積極貫徹中共的要求參加「三反」運動的人員；用這些人員來取代原有的在「三反」運動中出現問題或者是不積極參加運動的人員，或者是中共不甚了解的幹部，無疑會極大地促進中共對幹部隊伍的整合，增強了幹部對中共和新政權的認同感。

在「三反」運動之後，雖然中共在某些部門用「三反」運動中湧現的積極份子來取代之前不太了解或者有嫌疑的幹部，但由於還沒有大量的幹部來補充這些被處分幹部離開後所留下的空缺，中共在對這些部門的幹部進行清理時還是採取緩進的方針，即先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這種調整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如中國人民銀行蘇南分行在「三反」後調配幹部時就遵循了這樣的原則²³：

由於在提拔幹部時秉承的是「大量提拔在『三反』運動中的積極份子」的原則，所以有理由認為，這些被提拔的幹部基本上是對新政權和中共持有認同感、能積極貫徹中共的要求參加「三反」運動的人員。

第一，將政治品質優秀的忠誠可靠有培養前途的幹部，即使業務能力低也大膽放手調配到各級領導地位上，作為各級組織的核心，在實際工作中加以培養提高，這些幹部調配到新的崗位上是會感到不夠熟悉，但這是暫時的，不足為懼的，尤其他們總比那些表面上掛着為人民服務的招牌，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堡壘要好得多。第二，對於重要的要害部門和分散獨立有全面業務性質的單位，要特別加強骨幹幹部的調配，同時在重要的要害部門中的一般幹部，也要做到適當的調整，以保證我們要害部門的絕對純潔和組織上的健康。第三，在一般部門中，也須保持一定數量的骨幹幹部，便於掌握。第四，對繼續留用的貪污份子，均分散調配在能夠控制的一般部門和次要的工作崗位上，使他們無法做破壞勾當。第五，在重要和業務性較強的部門，現有幹部不可靠，無適當幹部代替原幹部，則暫不調出，另配備骨幹前去學習，待經過一定時期後，再行調整。

四 結論

通過以上的敘述，我們能夠看出以下四點：第一，在江蘇「三反」運動中，幾乎每一個幹部都要參加「三反」運動，並且發現貪污份子數將近佔到幹部總人數的40%²⁴，這也證明了運動的深度和廣度。在運動中，許多幹部的政治問題和歷史問題紛紛得以暴露，加強了中共對幹部的認識和了解。第二，在「三反」運動中，確實有一些幹部被清理，清理的形式包括撤職、降職、清洗和法辦等，這些幹部既包括黨員老幹部，也包括一些留用人員和新吸收人員，但主要集中在後兩種人中。第三，中共通過「三反」運動還造就了大批積極份子，他們基本上都對新政權和中共持有認同的態度，就如《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中所說的，「運動本身也造就了大批對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持明顯的忠誠

態度的新幹部」^⑳。而中共正是用這些積極份子來取代之前不太了解或者是歷史不清的幹部，以達到對幹部隊伍整合和清理的目的。第四，從這種意義上而言，「三反」運動是建國之後中共發動的第一次完全針對幹部的政治運動，也是一場中共清理幹部隊伍的運動；從結果來看，中共也基本上實現了清理一部分幹部、補充一部分幹部和調整一部分幹部的目標。但是，對中共這樣對自身的純潔高度重視的政黨來說，這樣的清理是不會停止的。但無可否認的是，這種清理對於中共自身的鞏固和新政權的鞏固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三反」運動是建國之後中共發動的第一次完全針對幹部的政治運動，也是一場中共清理幹部隊伍的運動；從結果來看，中共也基本上實現了清理一部分幹部、補充一部分幹部和調整一部分幹部的目標。

註釋

- ①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293。
- ② 胡其柱：〈工人、資本家與共產黨——1952年「五反」運動研究〉，《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5年12月號，頁59-65。
- ③⑧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165-66；274-75。
- ④ 蘇南區黨委組織部：〈蘇南級直屬機關三反中幹部情況統計表〉，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06，長期，案卷號158。
- ⑤⑥⑦⑬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166-67；193；215-16；596。
- ⑨ 松江地委組織部：〈松江地專機關有關問題人員處理情況統計表〉，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06，短期，案卷號143。
- ⑩ 中共常州地委：〈本區關於整理中層的進行情況報告〉，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64，短期，案卷號5。
- ⑪ 常熟市委組織部：〈蘇南區常熟市各級機關內部不純情況統計表〉，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06，短期，案卷號168。
- ⑫ 高華：《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頁26-27。
- ⑭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64-65。
- ⑮ 轉引自高華：《身份和差異》，頁27。
- ⑯ 中共蘇南區黨委組織部：〈從三反運動中了解、研究幹部工作的通知〉，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06，短期，案卷號154。
- ⑰ 蘇南人民行政公署辦公廳：〈一九五二年保密計劃〉，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70，短期，案卷號156。
- ⑱ 蘇南區黨委組織部：〈部務會議記錄〉，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06，長期，案卷號145。
- ⑲ 中共蘇北區黨委組織部：〈關於三反與整黨相結合的通知〉，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01，永久，案卷號67。
- ⑳㉑ 蘇南區黨委組織部：〈三反中幹部情況統計表〉，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06，長期，案卷號158。
- ㉒ 〈陳光同志在蘇南區黨委一九五二年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06，短期，案卷號144。
- ㉓ 〈中國人民銀行蘇南分行三反前後人事工作情況匯報〉，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70，長期，案卷號1823。
- ㉔ 蘇南區黨委組織部：〈蘇南區及地、市一級機關各系統三反中幹部情況統計表〉，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06，長期，案卷號158。
- ㉕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主編，王建朗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96。